

下五旗,旗营制度的百年印痕

张希

天津武清东北隅的“下五旗”,绝非寻常乡野称谓,它是清廷为解决八旗生计、经营京畿而推行的一项特殊屯垦制度所留下的深刻印痕。

光绪七年(1881)《武清县志》卷二《建置志·庄头屯》明确记载:“下五旗庄头地,雍正五年置。”这一时间节点与清廷政令高度契合。《清世宗实录》卷五十二载,雍正五年(1727)正月,皇帝为解决八旗人口繁衍、生计困顿之弊,谕令于京畿旷土推行屯垦:“古北口至雄县一带,沿边旷土甚多……八旗满洲、蒙古、汉军内,有情愿下乡种地者,著各该旗都统查明,奏闻派往。”而武清东北部的这

片沃野,遂成为首批实施区。说到八旗,还有上下之分,“正黄、镶黄、正白”因直属皇帝统领称为“上三旗”,其余各旗统称“下五旗”。《武清县志》指明,此地专拨予满洲八旗中地位次于“上三旗”的正红、镶红、正蓝、镶蓝、镶白五旗,即“下五旗”之庄头管理。

下五旗庄头辖地的管理,遵循着一套迥异于州县民地的特殊规则,其核心在于旗地不入州县版籍,庄头直属旗衙。这一制度特征,在《通州志》卷五《武备志·旗营》中有清晰印证:“凡旗营庄田,隶于本旗都统衙门或内务府,地方有司不得与闻赋役、词讼。”通州作为京畿

漕运咽喉,其旗营管理通例极具代表性。

当时,庄头作为旗衙(本旗都统衙门或内务府)直接委派的代理人,地位超然于州县官吏。《通州志》载,旗地“钱粮自征自解,丁役自派自应”,地方州县无权征派赋税、徭役。下五旗庄头同样“管领屯地,督率壮丁耕种,征收旗租”(《武清县志》),所收租银直接解缴旗衙,不纳入国家正赋体系。

《通州志》详述旗营内部“户婚、田土、钱债细故,及旗丁斗殴等事,由本管佐领、庄头处断;惟人命、强盗重案,方会同地方有司勘审”,这清晰地勾勒出“小事旗管,大事会审”的原则。武清下五旗地域内旗丁间的纠纷,必由庄头依旗规裁决,形成实质上的“法外之地”。

庄头不仅是经济管理者,更是军事化组织的基层头领,负有督率旗丁“务农讲武,以备调遣”(《畿辅通志》卷九十五)之责。旗丁聚族而居,形成耕战结合的屯堡式聚落。这种亦兵亦农的组

织形态,是旗营制度区别于普通乡村的核心标识。

这套独立王国般的运行体系,在武清东北部整整运行了二百年。随着民国肇建,旗制废除。据民国《武清县志》载,下五旗庄头特权被剥夺,旗地经“清理旗产”丈放,或归原佃户承买,或招民垦种,逐步纳入县府统一管辖的民田体系。昔日的特殊管理架构烟消云散。然而,“下五旗”之名,却顽强地留存于这片土地之上。民国十三年(1924)《武清县志》的《区村镇图》中,“下五旗”已明确标注为一个具体的村落名称。这标志着它完成了从“行政制度名称”(下五旗庄头地)向“纯粹地理名称”(下五旗村)的历史性转化。

今日的下五旗村,已难觅当年旗营壁垒的森严遗迹,但地名本身,就是一段历史最坚固的纪念碑。它无声地诉说着八旗制度的百年兴衰,以及普通旗丁在特殊制度下亦兵亦农的命运轨迹。小地名,实为打开大历史的钥匙。

与老天津电车发展息息相关。且说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在西南角建起车库,后经一年多的筹备和轨道铺设,第二年天津有轨电车正式开行。白牌电车初为单轨,再过一年改为双轨。1908年,天津又开通了黄牌、蓝牌、红牌三条电车线路。此后,绿牌电车于1918年通车,花牌电车于1927年通车。到了1947年,天津增设由金钢桥到北站的紫牌电车,从此形成了当时天津有轨电车的“七彩线路”。

没辙了

由国庆

虎子三十多岁了,天天玩玩闹闹,就是不想着找对象、结婚成家,街坊四邻给介绍过多个女孩,可他愣是一个也瞧不上。如此这般,气得他妈常常数落虎子:“我一把年岁了,都快愁死了,拿你真是‘电车出轨——没辙了’。”车与辙,这话



李叔同在津时,听亲戚朋友们说,北方仍然兵荒马乱,去河南的路上土匪横行,人身安全难以保证。尽管他焦灼不安,赴河南看望二哥的计划终是无法实现了。寒食节那一天,李叔同为世交华伯铨书扇,一面用小篆书写了唐人张祜的怨情诗:“故国三千里,深宫二十年。一声何满子,双泪落君前。”另一面是仿时人陶潜宣的魏碑体书法而录下的自己新作《遇风愁不成寐》。

李叔同这次天津之行,前后将近一个月。1901年3月间,他仍由海路南下。在津期间,耳闻目睹了庚子事变前后的津门惨状,更是满腔忧愤。回到上海,他将二月间北上探亲的经过与所见,以日记体写成《辛丑北征泪墨》。将诗词另行辑出,寄给天津的赵元礼先生。

其中《感时》一诗云:“杜宇啼残故国愁,虚名况敢望

《河北区志》称:“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来津至园演讲,改称‘天津中山公园’”。但通过查阅当时的报纸,这种说法值得推敲。

1924年以来,由于军阀驻军占用河北公园(中山公园曾用名,下同),致使市民缺少了一个游憩之处。1928年北伐成功后,恢复河北公园成为市民的呼声。

同年7月14日,天津《大公报·小公园》刊登一篇署名高风的《小建园议》:“当此民众解放的革命军下的新天津,何妨就把它改为‘中山公园’,还诸民享呢?”直到1928年10月,当局提出“改河北公园为中山公园,请市政府拨款修葺”,但这只是停留在建议之上。真正实施起来,又经历一段时间。可见,“河北公园改为中山公园”是来自民众的呼声。

1929年3月,天津市工务局制定维修规划,重新修筑公园墙围及亭池,约需要三万元左右。3月7日,“议决于十一日将中山公园修改竣事。门前均须刷新,标明‘中山公园’”。由于河北公园的管理由公园董事会负责,还须得到他们的认可。

1929年3月11日《庸报》刊登消息《河北公园改中山公园,昨日董事会开会决议》记载:“3月10日上午,河北公园董

事会借河北娄鲁青宅召开常务会议……于12时开会,由王静庵主席提议河北公园应改中山公园,议决通过,即将大门牌匾照议改换。”可见,确切的更名时间应是1929年3月10日,更名为河北公园董事会常务会议的决定,并且即日将公园大门牌匾更换。

据天津《大公报》1929年3月11日《中山公园今日可修理完竣》载:“……纪念筹备大会,议决改河北公园为中山

公园后,连日以来,已着手修理。刻门前已一律刷新,园内小亭及土山、水池等亦正在粉饰。植树地点亦挖掘妥当,今日当可竣工。多年颓废之荒场,形将一变而为葱茏蓊蔚之所矣。”可见,3月11日公园更名同时,进行了简单的修饰。

根据纪念大会筹委会的安排,除举行纪念公祭活动外,还在更名后的中山公园举行植树典礼活动。准备在土山亭上树一块横匾,名曰“中山林”。“亭下植树,树木编成字形或三角形、四方形。候绘成图案,由市府核办。修亭工及植树图样布置,由工务局负责。购树秧,由特别三区负责”。

1929年3月12日,纪念大会举行,到会各界代表及市民两千余人。散会后,各界人士在中山公园植树。

公园更名来自民众呼声

曲振明

●津门园忆之中山公园摭忆

打荏头

王宗征

●儿时伏天乡村记忆旧之四

到了农历末伏,家里多了一种美味菜肴,那食材有个好听的学名“乌米”,就是寄生于高粱上的一种可食用菌,村里人称之为“荏头”。采集荏头,叫“打荏头”。

早些年,我们村里种植有防涝的高粱,但传统种植容易使高粱发生黑粉病,产生荏头,影响产量,特别在末伏,高粱荏头形成最多。不过,村里人视荏头为美味。荏头确实好吃,可生吃,也可炒食、炖食、蒸食,是末伏时节宝

坻农家一道常见菜肴。我尤其爱吃母亲用鲜嫩的高粱荏头做成的菜。她把荏头清洗干净,控除水分,放在一个大碗里,备好葱末、蒜片、花椒粉等作料,并用自制的豆瓣酱掺半碗酱油。烹饪时,先用油煸炒作料,再把荏头倒入锅中翻炒,待荏头即将炒熟时烹入酱油,顿时美味扑鼻。

打荏头,当年村里人都愿意干,以男村民最有经验。末伏时节,降雨仍多,高粱生长正旺,产生的荏头在高粱秧顶端,如不会识别,还误以为是高粱穗苞。打荏头通常选择在阴雨天。村民们戴着草帽,一手拿镰刀,一手提着布袋子,赤脚踏泥田,紧盯高粱顶,一旦发现荏头,便将那棵高粱拉低、按住,用镰刀将长着荏头的高粱顶端砍下来,再剥开包着荏头的绿叶,把荏头采摘下来,放入布袋。如此打荏头,又快又准。

小时候,我曾多次随父亲到高粱地里打荏头,但他却不让我独自打荏头,担心我识认不准,会把高粱穗苞错当成荏头。我只能帮父亲拿布袋子。但即便这样,也体验到了伏天里打荏头的收获与快乐。

●老口福

摊咸食

杨世珊

摊咸食是上世纪60年代西楼一带邻居们爱做的一道菜。那年头儿是计划经济,街道代表会顺着胡同喊一嗓子:“绿门儿(一个副食店)来西葫了!”于是人们一边呼唤左邻右舍,一边跑着颠着去买。

西葫在人们印象中只有包西葫羊肉馅的饺子才正宗,但那时只有逢年过节才吃饺子。那西葫还能怎么吃呢?邻居陈婶说,做糊塌子吃好啊。管婶则说,也就摊咸食吃呗。其实她们说的是一样的菜,只不过叫法不一样而已。

那年头的西葫个大且老,没有现在这样很小很嫩的西葫。陈婶做糊塌子,先将西葫洗净刮皮后,掏净瓢

子,擦成细丝,不用焯水也不用盐杀,磕上几个鸡蛋,加一把小虾皮,搁些白面,和成馅状,饼铛抹上油烧热,再用勺舀到饼铛里,用铲子摁成小饼状。由于水分较大,需多煎一会儿,定形后翻面,翻两三次后,正反两面便形成了枣红色的硬嘎,这时便可出锅了。

管婶摊的咸食要粗犷些,如一个茶碗大小,厚有一厘米,两面出嘎,外酥里嫩。因和馅时怕其出水,所以基本不放盐,吃时需要另配一个清酱、醋、香油、辣油混合而成的蘸料。吃一口咸食,蘸一下料,格外带劲。

也有人家不叫摊咸食,也不叫糊塌子,和馅时挤干西葫的水分,放盐,为了找色儿还放一点儿清酱,接着将面粉掺入其中,增加黏稠度,然后用手攥成小饼儿,放在炙炉上烙。那年头儿粗粮、细粮按比例供应,白面、棒子面两掺,烙薄饼子,用饼夹着吃,是最好的搭配。

●李叔同的爱国情怀(二)

辛丑泪墨

章用秀

1900年庚子之变,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,七月占领天津,八月占领北京,慈禧挟光绪帝出逃西北。身在上海的李叔同万分牵挂战乱中的二哥文熙和天津的戚友。1901年(辛丑年)2月,李叔同北上探亲。他打算先由海路去天津,再转河南内黄县,看望正在那里处理事务的二哥。

轮船在海上航行,一路还算风平浪静。驶进大沽口时,眼前却是破房瓦砾,一派萧然。李叔同触景生情,写下一首《夜泊塘沽》的诗。下船后,未能赶上早晨开往市内的火车,只得找客店歇息。兵燹过去,旅店破烂不堪,既无门窗,又无床几,吃

的喝的一概没有。李叔同忍饥挨饿,靠着行李箱,委坐在地上。直至傍晚,才搭上开往市内的火车。车窗外满目疮痍,许多房屋被烧,成了残垣断壁。

来到津城,一切都变了样。城墙被拆除大半,城内遭到了洗劫,一些老百姓无家可归,露宿街头。头几天,他寄住在城东姚家。李叔同二哥的内兄姚品侯、姚召臣与他促膝交谈。李叔同青少年时的知交师友孟广慧、华世奎、马家桐、王襄、王钊、朱易谙、赵元礼、徐士珍、王新铭、李采蘩等津门名流,听说他回来了,也纷纷前来,与他叙旧。虽说分别仅两年多,却恍若隔世,感慨万千。